

明中晚期士人的訓蒙理念、 實踐與多元思想競逐 ——以《小學》的改本與注本為中心*

謝 曉 東**

摘 要

宋元至明初士人的訓蒙理念與實踐大都遵照朱熹倡導的「小學」工夫。但隨著明中晚期思想版圖的分裂，陽明學與湛學在訓蒙的理念和實踐層面較明前期呈現出多元的面貌。陽明學者認為孩童自幼便知愛親敬長的觀點以及對「良知」的提倡均削弱了閱讀《小學》的必要性，這也是導致明中晚期《小學》邊緣化的原因之一。但是，《小學》邊緣化的原因並不限於此，同屬理學傳統、且立場相對溫和的陽明學者面對這一現實，也嘗試從「良知」的角度改變《小學》邊緣化的處境。面對陽明學的衝擊以及《小學》邊緣化的現實，明中晚期的程朱學者努力捍衛「小學」工夫在訓蒙領域的正當性，並對《小學》文本進行了不同於前賢的改動。湛若水所編的《古文小學》雖因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導致編寫初衷和文本呈現之間有自相矛盾之處，但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古文小學》既剔除了《小學》中的宋儒言論，從而彰顯「隨處體認天理」的觀點，同時也表達了對陽明學所倡「良知」的批評。明中晚期思想競爭對社會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

2021年10月8日收稿，2022年3月3日修訂完成，2022年7月22日通過刊登。

* 拙文的寫作得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張佳老師指導，復承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惠示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 作者係新加坡國立大學漢學系博士研究生。

其影響下滲至《小學》這類面向孩童的蒙書便是體現。對中晚明《小學》與訓蒙理念與實踐的討論，有助於豐富我們對中晚明多元複雜思想世界的認知。

關鍵詞：小學、訓蒙、程朱學、陽明學、湛若水

一、前言

相較於明前期「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¹的思想版圖，正德嘉靖以後多元思潮（尤其是陽明學）的興起，使得士人在經典閱讀和科舉參與等領域皆呈現出與明前期不同的情況。²中晚明並起的多元思想對原有思想世界的衝擊是無遠弗屆的。多歧的理解不僅體現在《大學》這類面向上層精英的經典，也體現在《小學》這類訓蒙讀物中，進而影響著時人的訓蒙理念與實踐。

「小學」這一概念具有多重含義，³而在朱熹（1130-1200）等理學家的思想體系中，「小學」主要指以灑掃應對、愛親敬長為主要內容，以修身養性為目的訓蒙工夫。士人應在其孩童時期就踐行「小學」工夫，這樣才能為將來「格物」和修齊治平的「大學」工夫奠基。朱熹認為先秦時期存在《小學》一書，只是全書在後世亡佚，內容雜見於各類傳世文獻。因

1 清·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 10〈姚江學案〉，頁 178。

2 陽明學對時人閱讀《四書》、尤其是《大學》的影響可參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6）；陽明學對明代科舉應試讀本的影響，可參看周啟榮，〈從坊刻「四書」講章論明末考證學〉，收入郝延平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 54-68；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頁 183-186。

3 張舜徽在注解《四庫提要》「小學類序」時總結道：「小學一目，歷代沿用，而內容各有不同。蓋有漢世之所謂小學，有宋人之所謂小學，有清儒之所謂小學。自不可強而一之，學者不容不辨。」張舜徽，《四庫提要序講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 58。

此，他搜羅經史子集 32 家，從中抄錄出 386 個條目，其中包含許多宋儒言論與事蹟，歸類為〈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嘉言〉和〈善行〉等篇，匯成《小學》一書。朱熹強調：「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朱熹希望《小學》一書可以「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于風化之萬一」。⁴

目前學者對《小學》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其哲學意義、編撰情況和閱讀實踐等方面，⁵ 較少探討《小學》在後世的文本變化以及背後折射的思想史信息。⁶ 朱熹倡導的「小學」之教和他參與編撰的《小學》，⁷ 在宋元至

4 宋·朱熹，〈小學原序〉，《小學》，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393。朱熹有關「小學」的論述，可參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4 冊），卷 7〈學一·小學〉，頁 268-274。

5 有關對《小學》或「小學」在朱熹思想體系中的地位，相關研究可參考：M. Theresa Kelleher, "Back to Basics: Chu Hsi's *Elementary Learning (Hsiao-hsüeh)*," 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ed.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19-51; 郭曉東，〈因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淺談朱子之「小學」對於理解其大學工夫的意義〉，《中國哲學史》2019.4(2019.8): 44-49；（日）松野敏之，〈朱熹『小学』と朱寿昌譚〉，《國士館人文學》50 (2018.3): 77-91。有關《小學》的編纂情況，可參（日）松野敏之，〈宋代訓蒙書と朱熹『小学』〉，《國學院雜誌》117.11(2016.11): 190-206；〈朱熹『小学』編纂考——劉清之小学書からの改修に関して——〉，《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13(2004.12): 1-26。有關《小學》在元明時期在地方與教育機構的應用，可參王蘭蔭，〈明代之社學〉，《師大月刊》25(1936.2): 63-129；池小芳，《中國古代小學教育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6 趙克生，〈童蒙教育與朱子學的下移——明清時期兒童的《小學》閱讀〉，《社會科學輯刊》2016.1(2016.2): 132-142。一文從宏觀的角度探討了《小學》在明清時期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位置，並從科舉制度和學術轉向等方面討論了《小學》在晚明邊緣化的情況，可惜論述較為簡單。張藝曦則從王學盛行的角度提及作為程朱學經典的《小學》在晚明被人刪削或冷落的情況，見氏著，《陽明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53 註釋 1。

7 關於《小學》的編撰者，從朱熹與其弟子劉清之的書信往來中可知，該書為兩人合編完成。參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版）》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明前期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當作訓蒙領域的重要指導被士人遵奉與踐行。他們不僅在思想言說和教學實踐中提倡「小學」工夫，同時出於羽翼《小學》的目的，對其文本進行詳細的注解與補充。然而，隨著多元思想的並起，明中晚期士人的訓蒙理念以及對待《小學》文本的態度均出現了不同以往的變化。本文便聚焦於這些變化的表現、背後的思想動機以及產生的社會反響等層面，探討明中晚期訓蒙理念和實踐與多元思想競逐之間的聯繫。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探討的「《小學》改本」，是指明代士人對朱熹《小學》內容改動後的文本。雖然宋元以降有名稱中包含「小學」二字、但與朱熹《小學》並無關聯的訓蒙讀物，⁸但是，由於程朱理學正統地位的日益提升以及《小學》一書在宋元以來經歷的「經典化」過程，當明朝士人談及《小學》時，所指基本為朱熹《小學》。本文涉及的明代《小學》改本，儘管它們的改動程度有大有小，但是改編者均明確表示其對話對象是朱熹及其《小學》。

2014），頁 773-774。但由於歷代目錄書多數直接著錄《小學》的作者為朱熹，因此本文為了行文方便直接將朱熹與《小學》並稱。

- 8 例如，宋代王應麟編有《小學紺珠》，該書是幫助童蒙了解「庶事」、增長見聞而編的類書；宋人南宮靖一所編的《小學史斷》，則是幫助童蒙學習歷史的編年史讀物，該書在相關史實後附有宋儒的評論，在明代也有續編本（以上兩種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元代民間還流行有《小學日記故事》這類通過通俗故事教導童蒙孝悌行善的讀物，該書在明代也有諸如由管晌增補的《新刊明解圖像小學日記故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有關元明《日記故事》及其相關文本的研究，可參林桂如，〈《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在日本之傳播〉，《東吳中文學報》34(2017.11): 91-118。這些童蒙讀物雖名「小學」，但與朱熹《小學》並無對話性。再如，李元度曾於光緒五年編有《小學弦歌》。李元度鑑於「《小學》中錄詩止數篇」，因此「竊體程朱之意，撫古今詩之可以厚人倫，勵風俗者，博觀而約取之，匯為一編，以教小學（中略）冀附《小學》以行，而因以求合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八年刻本）。該書可視為以「小學」之名新編的童蒙讀物，且未必算是「《小學》改本」。但是筆者目前沒有發現明代有類似的文本。

二、述朱：宋元至明前期的「小學」之教與《小學》注本

自淳熙十四年（1187）《小學》成書以來，諸多朱門弟子或宗朱學者均極力推崇《小學》。朱熹的親炙弟子陳淳（1159-1223）在教學實踐中相當尊奉「小學」之教和《小學》。⁹ 朱熹再傳弟子饒魯（1193-1264）則對「小學題辭」和《小學》正文進行解釋，¹⁰ 以闡發朱熹編撰《小學》的用意。元明士人在刊行《小學》時也會借鑑其注解。¹¹

蒙元政府在地方社學和中央官學中積極推廣《小學》。¹² 不少元儒在訓蒙領域也十分推崇「小學」工夫和《小學》。例如許衡（1209-1281）在教學實踐中便以《小學》為主要教材。他曾著《小學大義》以闡發《小學》的宗旨。許衡遵循朱熹「小學」為「大學」確立基礎的觀點，因此在《小學要義》後又作《大學要略》，並著有《總論小學大學》。¹³ 北方的儒者劉

9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26〈答陳伯澡（一）〉和〈答陳伯澡（三）〉，頁704-706、卷30〈答梁伯翔（一）〉，頁737、卷47〈上傳寺丞論民間利病六條〉，頁872。

10 饒魯對《小學題辭》的注解基本完整地流傳下來。他將《小學題辭》注解為「小學者，小子之學也；題辭者，標題書首之辭也」，然後以四句或八句為一組，將由四字韻文組成的題辭正文，解釋為更加直白淺近的語言。除此之外，饒魯對《小學》正文的注解在清人所輯的《饒雙峰講義》中也能看到一部分。見清·王朝璩，《饒雙峰講義》（《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二輯）》第1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16〈小學〉，頁472-474。

11 在元代刊刻的《小學集解》中，關於〈小學題辭〉的注釋通篇引用饒魯的文字；明儒所作的《小學》注本在〈小學題辭〉的分節方面基本依循饒魯的做法，可見饒魯《小學》注對後世《小學》注本的影響力。上海圖書館藏有元刻本《小學書》殘本，其〈小學題辭〉注釋中便明言「雙峰饒氏分為十節，今從之」。可見饒魯對〈小學題辭〉的分節是後世《小學》注釋或刊刻者的重要參考之一。

12 蔡春娟，〈元代《孝經》與《小學》的地位及受學狀況〉，《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2019.12): 22-30；（日）牧野修二，〈元代的儒學教育：教育課程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37.4(1979.3): 536-558；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272-275。

13 元·許衡著，許紅霞點校，《許衡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125。

因（1249-1293）、¹⁴ 蕭𧇖（1241-1318）¹⁵ 和南方的吳澄（1249-1333）¹⁶ 也都重視訓蒙的「小學」工夫，認為它關乎「天理」，是「大學」工夫不可缺少的鋪墊。

元代有關《小學》的注本可考者有數十種，¹⁷ 較有代表性是何士信（生卒年不詳）的《小學集成》。該書是由何士信收集諸家諸注而成的匯注本，現存有多種元刻本。¹⁸ 該書分〈小學圖〉、〈小學書綱領〉和〈小學〉注解正文三部分。〈小學圖〉按主題分為「立教」、「明倫」和「敬身」三類。這些圖的內容多與《小學》中摘編的條目主題相關（參圖一、圖二）。〈小學題辭〉完全採用饒魯的注釋。〈小學書綱領〉分「兼論小學大學之要」、「總論小學工夫之要」、「論過時而學當補小學之功」、「門人編次《小學》書之旨」、「門人質問《小學》書之疑」、「子朱子論先儒注疏異同」和「論《小學》有功於世教」等部分，輯錄了朱熹和許衡等宋元儒者有關上述話題的論述。《小學》文本的呈現形式在元代日趨豐富。

14 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叢書集成新編》第 6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 2〈篆隸偏旁正偽序〉，頁 87。

15 元·蘇天爵著，陳高華、王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8〈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左諭德蕭貞敏公墓誌銘〉，頁 119。

16 元·吳澄，《吳文正公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 17〈贈成用大序〉，頁 319。

17 被歸為元代的《小學》注本至少有：許衡《小學大義》、劉因《小學四書語錄》、蕭𧇖《小學標題駁論》、熊禾《小學句解》、熊朋來《小學標注》、熊良輔《小學入門》、韓准《小學書闡疑》、李成己《小學纂疏》、蔣捷《小學詳斷》、薛延年《小學纂圖》等。清·錢大昕，《元史藝文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3，頁 253。

18 何士信輯《小學集成》的元刻本有日本尊經閣藏《諸儒標題注疏小學集成》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標題注疏小學集成》十卷存三卷、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小學書》十卷存四卷，以及上海圖書館藏《小學書》三卷。關於該書的版本學研究，可參金定炫，「《小學集成》元刻本及朝鮮翻元本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圖一



圖二

何士信《小學集成》（上海圖書館藏元刊本）「弟子授業之圖」、「子婦嘗藥圖」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古籍閱覽室

入明之後，明政府通過頒行《四書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書》將程朱理學定於一尊。官方對程朱學的推崇也直接刺激了明前期士人刊刻《小學》的行動。宣德九年（1434），熊道軒（生卒年不詳）彙集諸家注解而成《文公先生小學集注大成》，對於該書的出版意圖，熊道軒表示：

我聖朝纂修《性理四書大全書》，而《大學》之書煥然極備，已無餘蘊。然《小學》訓釋，猶未及見。（中略）雖以余之魯莽，已知僭妄之罪，然為國家興學導民之意，庶幾有少補云。¹⁹

同時，洪武和永樂年間有許多擔任地方教諭或訓導的官員，親自編撰有關《小學》的注解本以普及《小學》。²⁰《小學》在明前期的地方社學²¹和宮

19 明·熊道軒，〈文公先生小學集注大成凡例〉，不著撰者，《文公先生小學集注大成》（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宣德九年〔1434〕梅隱精舍刻本），頁4上。

20 例如洪武初年的常州府訓導黃常編著有《小學訓解》十卷、洪武中期的晉王府長史吳從敬著有《小學訓義》、永樂年間的訓導范從文和蔣明編有《小學章詁》與《文公小學注》，以及大理寺少卿仰瞻編有《小學講義》等。清·黃虞稷著，瞿鳳起等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3〈小學類〉，頁105-106。

21 王蘭蔭，〈明代之社學〉，頁112-133。

廷教育²²中也常被作為首選讀物。

明前期的南北理學士人有不少是《小學》的熱衷者。例如，在薛瑄（1389-1464）的思想體系中，「小學」這一下學工夫與追尋「天理」的上達工夫是貫通的，天理蘊含於倫常事務之中，二者並沒有精粗本末之分。他認為士人自幼只要躬行實踐《小學》中所涉及的父子、君臣和長幼等下學之人事，便能上達仁義禮智信等「天理」。²³薛瑄的再傳弟子周琦（成化十七年〔1481〕進士）曾專門羅列了一份他認為值得保存的書單，其中居首的便是《小學》。他認為此書單之外的書籍均可焚燬不讀。²⁴同為北方理學家的王恕（1416-1508）於弘治八年（1495）在陝西創立弘道書院，其子王承裕（1465-1538）作為書院的日常主持者，規定書院諸生每天實踐「小學」之教，內容包括習禮、灑掃和讀書等十四項具體的內容。²⁵

在南方理學群體中，吳與弼（1391-1469）與胡居仁（1434-1484）均強調躬行實踐的重要性，《小學》在他們各自的教學實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²⁶賀欽（1437-1510）則將《小學》運用於具體的地方教化中。當社學中有學生對老師傲慢無禮時，賀欽用「小學」之教強調的「隆師親友」

22 朱鴻林，〈明太祖的經史講論情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5(2005.1): 141-172。

23 明·薛瑄，孫玄常等點校，《薛瑄全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讀書錄》，卷3、卷9，頁748、856；《讀書續錄》，卷5，頁990。

24 明·周琦，《東溪日談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4冊），卷12〈著述談〉，頁220-221。

25 明·王承裕，〈平川先生類定小學規〉，明·來時熙，《弘道書院志》，收入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6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頁492-494。

26 吳與弼希望弟子閱讀《小學》時能夠「日驗於身心」，「須逐篇逐條玩味入心」，不能不讀《小學》而貿然閱讀其他經史書籍。參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2〈崇仁學案二〉，頁45；明·吳與弼，《康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1冊），卷8〈上嚴親書〉、〈與日讓書〉、〈學規（庚戌）〉，頁521、523和529。對胡居仁而言，以愛親敬長為要旨的《小學》與「小學」之教，既是胡居仁提倡「主敬存養」學說的重要依託，也成為他批評陳獻章和佛老等異端學說的思想資源。參明·胡居仁，《居業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4冊），卷2〈學問〉，頁14、32、卷8〈聖賢〉、〈經傳〉、〈佛老〉，頁72、78和87。

對其加以批評；鄉人中有兄弟爭奪房產，賀欽便給他們看《小學》「夷齊讓國」和「虞芮讓田」兩章，兄弟看後便感羞愧。²⁷雖然南北方理學家的教育理念與制度依託不盡相同，²⁸但是在明前中期尊朱的大思潮下，許多南北方的理學家均認可朱熹倡導的「小學」之教，並在教學育人時積極踐行和推廣《小學》。

明前期南北理學士人也積極投身於《小學》文本的注解工作中。前引宣德九年本《文公先生小學集注大成》，除了囊括元儒的注釋外，也用圖像的方式增加了許多理學化詮釋。例如，何士信所輯的〈小學圖〉主要借圖像的方式更加形象地展現《小學》中涉及的各類名物禮儀，而宣德本在何本的基礎上增加了許多極富理學色彩的圖畫，如「道學統宗之圖」、「論子思性道教之圖」、「論性情心之圖」、「性品氣品之別」等。這些圖部分與《小學》正文有關（例如「論子思性道教之圖」²⁹），而很多《小學》正文並不涉及（參圖三、圖四和圖五）。編者以圖像的形式將「性」、「心」和「氣」等理學概念直觀呈現的做法，可以理解為明前期官方化的程朱理學在《小學》這樣訓蒙讀物中的下滲。³⁰相較於元代的居家日用類書，明前期由內府刊行的《居家必用》新增《小學》的部分內容，以期用理學的道德規範塑造家庭教育。³¹另外，吳訥（1372-1457）的《小學集解》、陳選（1429-1486）的《小學句讀》和王雲鳳（1465-1518）的《小學章句》也是當時理學色彩鮮明的《小學》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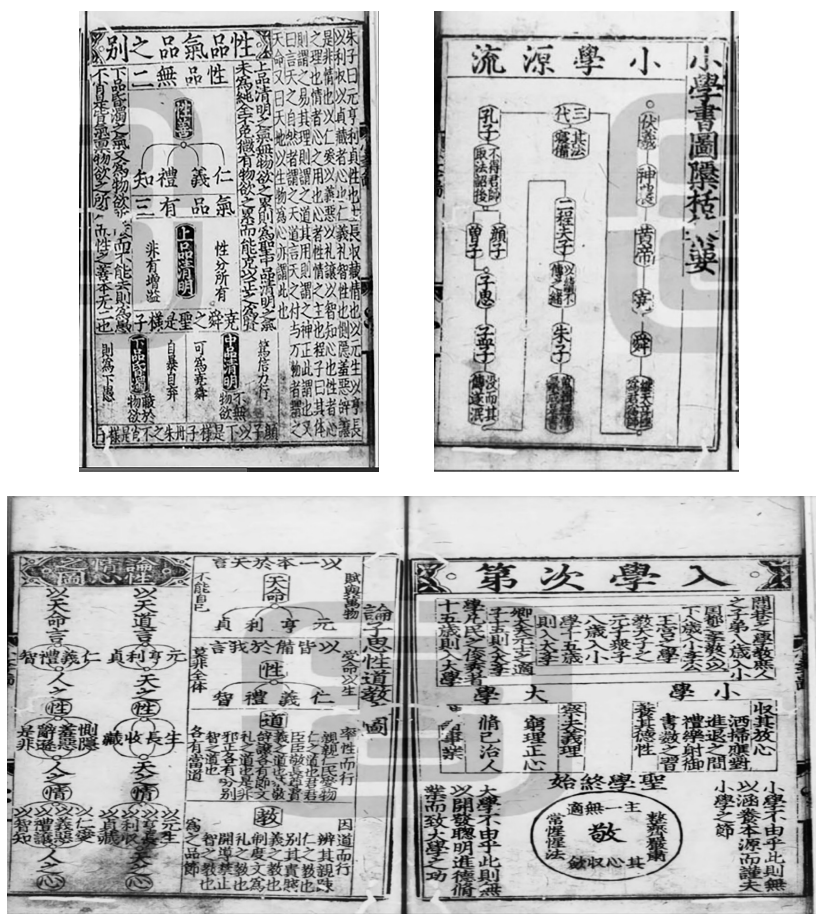
27 明·賀欽，《醫間先生集》（《叢書集成續編》第112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卷2〈言行錄〉，頁888、卷3〈言行錄〉，頁903。

28 許齊雄，〈國家政治目的和理學家教育理想在官學和科舉的結合〉，《漢學研究》27.1（2009.3）：87-112。

29 朱熹《小學》〈立教〉開篇就是「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則天明，尊聖法，述此篇俾為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

30 官方的《性理大全書》中專門有章節闡釋「氣質之性」、「心性情」和「道統」等內容。

31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2021.9）：509-560，尤其參考頁537-544。



圖三、圖四、圖五

《文公先生小學集注大成》（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宣德九年刻本）所載：「性品氣品之別圖」（左上）、「小學源流圖」（右上）、「論子思性道教之圖」（下）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網站（<http://www.ncl.cn>）

吳訥是典型的尊朱學者，他編纂有《性理群書補注》和《晦庵先生文鈔》等理學著作，其著述特點被概括為「一以晦庵為主題」。³² 陳選雖

32 明·嚴本，〈書性理群書補注後〉，收入明·吳訥，《性理群書補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宣德九年〔1434〕刻本）。

無多少論學語錄傳世，但根據他刊行《宋史》〈道學傳〉的行為³³和對許衡的推崇³⁴不難看出他宗朱的學術立場。陳選的注釋是以吳訥的注解為基礎，二者《小學》注最大的特點便是「以朱釋朱」。吳訥和陳選通常引用朱熹的觀點來闡明《小學》引文的含義。³⁵這種對《小學》的「加法」顯然與二人的尊朱立場密不可分。

山西人王雲鳳亦學宗程朱，³⁶且與當時王陽明正在形成的思想頗有齟齬。³⁷王雲鳳所作《小學章句》的特點有二：首先，王雲鳳針對他所見的《小學》「舊本」（即當時的通行本），在《小學章句》中對《小學》通行本中的個別章節進行了順序上的微調。例如，對於「司馬溫公曰：冠者」條，王雲鳳認為：「此一章『廣衣服』，舊本誤在『廣明倫』條內。今移於此，與內篇引士冠禮相應」。因此，王雲鳳將該章的位置後移。³⁸再例如「唐

33 明·陳選，《恭愍公遺稿不分卷》，收入徐曉軍、李聖華主編，《浙學未刊稿叢編（第一輯）》第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頁97。

34 陳選在督學河南時也曾刊行《魯齋全書》，並為許衡的《大學要略》做增補而成《重訂大學要略直說》，以便向士子表彰許衡之學。明·郝綰，〈大學要略序〉，轉引自元·許衡著，許紅霞點校，《許衡集》「附錄二」，頁649。

35 例如二者針對《小學》中引用到的《四書》條目，往往會全文摘錄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的注解而不加新的闡釋。弘治十八年（1505），明儒王鏊將吳訥的《小學集解》、陳祚的《小學正誤》和陳選的《小學句讀》彙聚在一起，編成《小學集注大全》十卷，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有明刻本。

36 明·韓邦奇，〈刊虎谷王先生墓誌序〉，明·王雲鳳，〈王公行實錄〉，《虎穀集》（《明別集叢刊（第一輯）》第81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頁473-474。

37 在王陽明的描述中，王雲鳳「自謂更無病痛，不須醫藥，又自謂不待人啟口，而已識其言之必錯」。王雲鳳又將王陽明鄙視為「鄉醫」，稱他「未曉方脈，故不欲聞其說」，而王雲鳳則自比「國醫」。「國醫」之喻極有可能是指當時居正統的程朱理學。而王陽明對王雲鳳的觀點頗感「未安」和「甚惑」。明·王陽明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4〈答王虎谷（辛未）〉，頁181-182；明·王陽明，〈答王應韶〉，束景南，〈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增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327-331。

38 《小學章句》是六卷本的劃分，因此該條目移動後仍在卷5〈嘉言〉。如果在十一卷本的《小學》中，該條目的移動就比較明顯，從卷7〈嘉言第五中〉被移至卷8〈嘉言第六下〉。明·王雲鳳，《小學章句》（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寬文七年〔1667〕刻本），卷5〈嘉言〉，頁24下。

鄭義宗妻」條，王雲鳳指出：「此一章言婦事舅姑之孝，內唐鄭義宗一條，舊本誤在後夫婦條內」。³⁹ 因此，他將該章的位置前移。⁴⁰ 其次，王雲鳳增補了極少數章節，從而使得《小學》文本的編排更具條理性和完整性。《小學》外篇〈善行〉部分舉了許多有關「明倫」的例子，但王雲鳳注意到，這些例子中缺少與朋友相關的內容。因此，他專門「輯朋友之可為法者四條補之」。王雲鳳自選自注了四則事例，並將它們歸為三個主題。⁴¹ 通過增補這四則事例，《小學》外篇〈善行〉部分的條目更加完備，能夠分別說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和朋友之義，其本編排更具條理性與系統性。

宋元至明前期的許多理學士人遵奉朱熹提倡的「小學」工夫與《小學》，這一時期有關訓蒙的理念與實踐也主要以此為標準，並無其它的異議。在《小學》文本方面，宗朱士人除了將《小學》應用於日常教學之外，也通過增加注釋、圖像、諸儒言論、微調文本順序和增加條目等方式使得《小學》一書在內容方面更加充實和具有體系性，也使得《小學》的程朱學色彩日益濃厚。

三、變朱：明中晚期多元思想競逐下的訓蒙理念與《小學》改本

正德嘉靖之後，明代士人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較之前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最主要的事件就是陽明學的興起。程朱學者往往將《小學》在中晚明時期的邊緣化歸因於陽明學的衝擊。唐龍（1477-1546）在重刊王雲鳳《小學集解》時便指出：

明興以來，咸知尊信而誦習之（按：《小學》）。上無異教，道德一矣；下無異學，風俗同矣。迨於近儒，衡異者惡其同，挾奇者厭其常，崇

39 明·王雲鳳，《小學章句》，卷 6〈善行〉，頁 17 下。

40 如果在十一卷本的《小學》中，該條目的移動同樣比較明顯，從卷 10〈善行第六中〉被移至卷 9〈善行第六上〉。

41 王雲鳳所補四章的具體內容，見氏著，《小學章句》，卷 5〈善行〉，頁 38 上-39 下。

虛者嗤其實，趨徑者，鄙其鈍。乃嚶嚶于朱子之言。⁴²

唐龍並不喜心學，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當王陽明在南昌與魏良弼（1492-1575）等眾弟子講學時，時任巡按御史の唐龍「守舊學相疑」，並且「以撤講擇交相勸」，⁴³而王陽明卻對此不以為然。⁴⁴因此可以推測，引文中的「近儒」主要便指正德嘉靖時逐漸成形的王學士人群體。清儒陸隴其（1630-1692）則認為「自正德、嘉靖後，學術分裂，《小學》一書且束之高閣」。⁴⁵其中的「學術分裂」，便指陽明學興盛後與程朱學競爭的事實。⁴⁶誠然，陽明學與程朱學不完全相同的訓蒙理念是導致明中後期《小學》邊緣化的原因之一，但是這一現象的出現也與《小學》文本本身的晦澀、其它訓蒙讀物的流行、以及《小學》長期未被納入科舉制度等原因有關。程朱學者將明中後期《小學》的邊緣化簡單歸因於陽明學的衝擊，其背後難免有因學術立場而導致的誇張或「想像」。陽明學的訓蒙理念不同於程朱學者，他們對「致良知」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消解了訓蒙「小學」工夫的必要性，明中後期程朱學者對此也多有駁斥。但是，程朱學者和陽明學者同屬於理學傳統，他們對訓蒙的理念與實踐均有關注，而且明中後期《小學》的邊緣化也是其共同面對的現實。因此，雙方也會採取類似但又不盡相同的方式，以便讓《小學》得到更廣泛地閱讀。

42 明·唐龍，《漁石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2〈小學集解序〉，頁387。

43 明·王陽明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附錄二·年譜二」，頁1455。《明史》的說法則更加直接，其中寫道王陽明講學江西時，唐龍「持論與守仁異」，因此「誠諸生勿往謁」。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283〈儒林二〉，頁7283。

44 明·王陽明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卷4〈復唐虞佐〉，頁215：「『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作。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己者。」

45 清·陸隴其著，王培友點校，《三魚堂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卷4〈小學集解跋〉，頁59。

46 陸隴其談到「學術」時往往即指程朱學與陽明學。參氏著，《三魚堂文集》，卷2〈學術辨上〉，頁20、卷3〈白鹿洞規說〉，頁46、卷8〈王學考序〉，頁141。

(一) 王學士人的訓蒙理念與實踐

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在平定南贛盜賊之亂後不久，便著手在「民風不善」的江西開展教化工作。他命令南贛所屬各縣百姓興立社學，並專門「延師教子」。⁴⁷與明初士人在邊鄙之地推行教化時大都直接讓當地人讀《小學》、《孝經》不同，王陽明專門頒布了《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和《教約》。王陽明認為先王之教不存的原因在於後世過於關注「記誦詞章之習」，因此他側重於誘導童子學習詩歌與禮樂。雖然他並不反對讀書，但主張「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王陽明傾向於發揮孩童的天性而避免他們被「句讀課仿」和規矩約束。⁴⁸熊秉真教授將該文與《小學》對比，認為二者是「近世幼教文化上的兩大路線之爭」，此說雖略顯誇張，但也確實揭示出程朱學與陽明學在訓蒙理念方面的差異。⁴⁹

而在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提出「致良知」之後，明中後期訓蒙理念的思想競爭便日趨明顯。程朱學與陽明學有關「小學」工夫的分歧可概括為「道問學」與「尊德性」的對立。程朱學雖然不否認童蒙與生俱來懂得孝悌的善心，但是，他們更側重於強調後天持久且嚴肅的學習因為唯有通過閱讀先賢經典並親身實踐，才能真正懂得孝悌等道理。就「小學」工夫而言，朱熹更強調「主敬」的重要性。⁵⁰而陽明學則傾向於從「尊德性」的角度放大童蒙生而有之、不待外在學習的「良知」，並認為朱學強

47 明·王陽明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附錄一·年譜一」，頁1425。

48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164-166。

49 熊秉真，《童年憶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39。岡田武彥指出：「朱子的小學教育是從保持性理之嚴正的朱子的性學精神中推導出來的，而陽明的小學教育則是從重視心之生意的陽明心學精神中推導出來的。」（日）岡田武彥著，吳光等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頁40。

5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7〈大學四〉，頁570：「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說主敬，莫是已具于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可。』」有關「敬」在朱熹思想體系中的意義，可參吳震，〈略論朱熹「敬論」〉，《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1(2011.1): 11-17。

調「主敬」工夫是多餘的。陽明學將良知視為人人固有的、內在的道德判斷，它作為一種先驗原則可以自然地告訴人們「好善惡惡」，其思想資源來自《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一語。許多王學士人對蒙養的理解也深受此章影響。

孩童「不學不慮」便懂得愛親敬長的觀點在王學士人的表述中十分常見，這種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學》閱讀的必要性。弟子曾問王陽明侍奉父母過程中「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是否應該先學習孝順之「理」。王陽明強調「心即理」，孝順之心是孩童與生俱來的，因此「不須外面添一分」，不用額外學習孝順的道理。⁵¹ 王畿（1498-1583）在詮釋「蒙以養正」時指出：後世不懂蒙養的方法，擔憂兒童「蒙昧無聞」，因此「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但這種做法是有害於兒童的。王畿主張應將「種種知識技能外誘」全部屏絕，使孩童的良知良能自然發展。⁵² 鄒守益（1491-1562）也堅信愛親敬長是孩童「不學不慮，天然自有之性」的良知，它「不靠師友，不借經書」，兒童「不待教」便會有愛親敬長的行為。⁵³ 王艮（1483-1541）也認為，教育孩子的方法只要讓他們日常孝順父母即可，無須刻意讀書學習，⁵⁴ 並相信對童蒙而言「孝弟為心，其理自識」。⁵⁵ 羅汝芳（1515-1588）則認為孝悌慈愛之心是「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的。在蒙養的過程中如果只「從書中陳跡」，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就會走向支離而最終無所成就。⁵⁶ 由此可見，在

51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頁 17。

52 明·王畿著，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4，頁 87。

53 明·鄒守益著，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3〈萬安郭氏續譜序〉，頁 121、卷 6〈九華山陽明書院記〉、〈婺源縣新修紫陽書院記〉，頁 332-333。

54 明·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938 冊），卷上，頁 326。

55 同上註，卷下，頁 359。

56 明·羅汝芳著，方祖猷、梁一群、李慶龍等編校整理，《羅汝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頁 10、104、108 和 116。羅汝芳並非真的完全摒棄一切蒙訓讀物，他自己就曾寫過《孝經宗旨》，但他在該書中仍然強調赤子之心是「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的（同前書，頁 431）。

許多王學士人強調童蒙「不學不慮」、良知自足的認知中，諸如《小學》這樣外在的經籍是沒有必要的。這也就不難理解王陽明的親炙弟子顧應祥（1483-1565）會直接貶低「灑掃應對」的價值：

愚謂小學之教，無非豫養而其良知良能而已。若其年已長矣，雖不曾豫養而其良知良能尚在，苟能從事於身心之學，去人欲而存天理，亦不謂之躐等，又何必屑屑於灑掃應對之末節而欲補之乎哉？⁵⁷

在王學士人的訓蒙理念中，不存在「小學」與「大學」工夫先後順序的「躐等」問題。程朱學者往往將「小學」工夫視為「大學」的根基，二者先後次第分明，而不少王學士人則傾向於不分「小學」、「大學」工夫的先後次第。鄒守益認為「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教」、「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只是後世不明古代的教法，才使得「後世歧小學、大學為二」。鄒守益強調後分的「小學」與「大學」其實均以修身為本，不必分先後。對待無論是「灑掃應對」還是「顛沛造次」等事，人們均應該以修身為本，「求諸吾身而自足」。他批評程朱學者過分向外關注書冊而不顧內心的格物取向，認為這樣只可能「求諸萬物而愈不足」。⁵⁸耿定向（1524-1596）也認為「小學」與「大學」是合一的、並由「赤子之心」貫穿始終：

學一而已。孰為大孰為小？夫不失赤子之心，斯為大人，則豫大學之基，不可不謹小學之教矣。古為小學者，善養其赤子之心而勿使失焉耳。舉斯心而善推之，斯為善學，非小學之外別有大學也。⁵⁹

胡直（1517-1585）也曾批評所謂的「循序之錮」。有弟子質問胡直古人學習「貴有序」、「不躐等」，而現在許多王學士人「唯心性之務先」，他擔心這樣會導致教學的先後順序紊亂。對此，胡直希望弟子擺脫「循序之錮」，因為心性「學之根與源」，世儒「窮索物理」的做法反而是本末

57 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84 冊），卷 2，頁 73。

58 明·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17〈跋古本大學問〉，頁 800。

59 明·耿定向著，傅秋濤點校，《耿定向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卷 11〈小學經傳序〉，頁 427-428。

倒置的。⁶⁰ 與鄒守益以「修身」貫穿「小學」與「大學」的思路相似，胡直以「心性」貫穿「小學」與「大學」，削弱了二者在程朱學者眼中必須分先後次第的重要性。

王學士人對程朱學繁雜「小學」工夫的反對，並不意味著他們對蒙養領域沒有關注。相反，王學士人在訓蒙讀物的編寫以及社學的教法方面均有富有王學色彩的實踐。相較於程朱學者在訓蒙領域對「道問學」的強調，王學士人對「尊德性」的信念使得他們更願意追求簡單易行和自然引導的訓蒙實踐。

在訓蒙讀物的編寫方面，不同於宋元以及明前期學者對朱熹《小學》的亦步亦趨，王學士人敢於對其文本進行大量的改動進而闡述自己的訓蒙理念。胡松（1503-1566）所改編的《刪正小學》便是一例。王陽明於正德八年（1512）至九年（1513）在滁州任南京太僕寺少卿，胡松曾前往問學。胡松早年對朱熹的《孝經刊誤》「信之弗疑」，但等到「會海內名儒與相揚榷」後，對此又「不能無疑」。⁶¹ 其轉變很可能是受陽明學的影響。胡松認為陽明的「致良知」是「孔門求仁之要，千聖相傳之真機的訣」。⁶² 他對「格物」的理解也以陽明為準。⁶³ 基於這樣的思想背景不難理解，雖然胡松選擇刪節《小學》的理由之一是因為「幼學病其繁」，但他希望《刪正小學》達到的目的在於「因良知良能之性而順導之，使其易曉而悅，則善心油然而生，生則惡可已矣」，⁶⁴ 這顯然是王學士人訓蒙理念的體現。

耿定向所編的《小學經傳》（又稱《小學新編》）則是王學士人改造《小學》的又一種體現。他不同意朱熹主張的古代「小學」已亡，認為「《論語》『弟子』一章，即小學之經具是矣」。因此他不理會朱熹《小學》的內容

60 明·胡直，張昭煒編校，《衡廬精舍藏稿》，卷 28，《胡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577-579。

61 明·胡松，《胡莊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91 冊），卷 1〈刻孝經序〉，頁 28-29。

62 同上註，卷 4〈重修陽明先生龍山書院記〉，頁 173。

63 胡松認為「夫今之為格物之說者，自陽明先生指點昭揭探懷示人，苟稍知從事，于學者夫人而明矣，更何贅言？」見氏著，《胡莊肅公文集》，卷 6〈格物解〉，頁 239。

64 明·胡松，《胡莊肅公文集》，卷 1〈刪正小學序〉，頁 35。

而「取六籍所載義相屬者，模《大學》傳而匯次之，擬為小學養蒙者」，旨在「俾赤子之心恒存勿失」。耿定向的弟子劉元卿（1544-1609）曾輯有《小學新編摘略》，由此可瞭解耿著的大致內容。劉書包括《小學經傳》與《小學衍義》兩部分，其中《小學經傳》載：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右經一章，蓋孔門養正之程矩，而聖功之實修也。竊輯經書所載而匯次之，為傳六章，以廣其指意于左。⁶⁵

該書分「廣孝」、「廣弟」、「廣謹信」、「廣愛眾」、「廣親仁」和「廣學文」六部分，每部分分別引《詩》、《書》、《禮記》以及孔子或曾子等人的話加以注解。⁶⁶《小學衍義》上篇則多引張載、二程、朱熹、薛瑄、王陽明等人的語錄來「論孝」、「論弟」、「論謹信」、「論愛眾」、「親仁」和「學文」；下篇則用歷史掌故以及當朝薛瑄、王陽明的例子來具體揭示「孝行」、「弟行」、「謹信行」、「愛眾」和「親仁」等內容。⁶⁷

除了對《小學》文本進行改動之外，王學士人還通過編輯簡便易讀的訓蒙讀物進行訓蒙實踐。例如，雖然鄒守益強調孩提「不學不慮」而自然懂得愛親敬長，但他並沒有忽視蒙養的重要性。他認為「入孝出弟，謹言慎行，愛眾親仁，餘力以學文」是聖人教育童蒙的要旨，如果「蒙養弗正，往往眩其所的，甚者至於逐末而忘本」，因此「須是知所先後，方不畔於道」。⁶⁸ 因此，鄒守益在嘉靖四年（1525）任廣德判官期間編了《訓蒙詩要》一書。鄒守益模仿王陽明虔臺之教，親自彙聚州縣的童子並教授詩歌禮樂。在實踐過程中他發現孩童有時不能理解自己的解讀，有時又夾雜「矜名喜利之詞」，會蠱惑兒童的心志。因此，鄒守益「取《詩經》之關於倫理而易曉者」，並選擇周敦頤、程頤、張載、朱熹、薛瑄、陳獻章、

65 明·劉元卿著，彭樹欣校，〈小學新編摘略〉（萬曆二十五年〔1597〕賀應甲刻本，現藏浙江省圖書館），《劉元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467。

66 同上註，頁 1467-1472。

67 同上註，頁 1473-1498。

68 明·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17〈寄龍光書院諸友〉，頁 803。

羅倫（1431-1478）、湛若水（1466-1560）和王陽明等人「切于身心而易曉」的詩歌，彙集成《訓蒙詩要》，囑同為王學士人的劉肇袞（生卒年不詳）與王仰（1495-1533）頒刻，分發給童子讓他們諷詠。⁶⁹ 鄒守益相信這一讀本可以擴充童子惻隱羞惡的四端，避免良心的限溺，從而實現「蒙以養正，弗納於邪」的目標。⁷⁰ 鄒守益編《訓蒙詩要》的思想動力與王陽明不無關係，他曾目睹王陽明在處州教授數百童子習詩學禮的場景，感受到「人性之善無不可教」。⁷¹ 因此，《訓蒙詩要》可以視作是王學士人參與地方教育實踐的體現之一，其關注詩歌禮樂的取向與呈現的形式，與《小學》側重先秦古奧的文本這一特點並不完全相同。

王學觀念也影響著士人對地方教學的認識。曾受王陽明學說影響的士人陳大綸（嘉靖八年〔1529〕進士）在贛州府為當地兒童興建社學，教授童蒙「聽樂」、「習禮」、「句讀」和「書算」等內容。羅洪先（1504-1564）對此陳大綸的做法格外欣賞。他特別從「良知」的角度強調，在社學教育中老師只需扮演引導孩童的角色：

人心之善，不可無養也。今夫正學之晦，自蒙始也。辭章功利，約有成說，及其長也，雖語以道，不復信之矣。養之以小學，亦曰猶夫蒙矣乎？蒙之去善未遠也。豫養而勿污，知愛知敬，仁義生焉。熙其光明，不撓於物，是故良知之瑩聖矣。學之為聖，非企以進也，養而復焉者也。灑掃應對，精義也，至簡也。徐行焉，所以弟也至易也。⁷²

羅洪先的觀點表明，在王學士人眼中，興建小學（社學）這類場所為童蒙

69 劉肇袞曾於王陽明在虔臺期間受學於其門下；王仰則在正德十五年（1520）師事王陽明，後又受學於鄒守益。參張衛紅，《鄒東廓年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70。

70 明·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2〈訓蒙詩要序〉，頁 25、卷 17〈南雍述教〉，頁 827-828。

71 同上註，卷 2〈論俗禮要序〉，頁 23。

72 明·羅洪先，〈小學記〉，收入清·魏瀛、魯琪光、鍾音鴻纂修，《（同治）贛州府志》（《中國地方誌集成·江西府縣誌輯》第 73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3），卷 68〈藝文志〉，頁 471。

提供蒙養教育是必要的。同鄒守益和耿定向等簡化童蒙讀物的邏輯相似，羅洪先認為教師在具體的教法上也應該是簡易的，他在社學中需要做的僅僅是用至簡的方式引導童蒙呈現與生俱來的「良知」，這樣孩童便會自然懂得愛親敬長的道理。

（二）明中後期程朱學者對「小學」之教的捍衛

儘管王學士人群體並未否定蒙養在孩童成人過程中的重要性，但他們的「變朱」言論引起了明中後期部分程朱學者的強烈批判。

崔銑（1478-1541）是正德嘉靖年間一位學問「以程朱為的」⁷³的宗朱學者。他直斥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曲解了孟子的本意，是「霸儒」的行為。⁷⁴正是基於這樣嚴格宗朱的學術立場，崔銑極力批評當時士人認為「小學」工夫多餘而棄之不講的現象：

大學者，全體大用之文，治與學一以貫之也。功始於格物者，承小學之後也。是故正容謹節，閑於六藝，幼學之心如泉出山，未之汙滑，自此道之避礙，而通於海。朱子曰『先事於敬』，補小學之廢也。近時有譏其贅者，妄也！⁷⁵

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主敬」是貫穿「小學」與「大學」的重要工夫。朱熹在《小學》中專設「敬身」一卷。而王學則對朱學提倡「主敬」多持不屑的態度。崔銑對王學的這一觀點深表不滿。崔銑將「小子之學」的內容界定為「其行愛親敬長事師，其役灑掃應對，其藝習禮誦書學字歌詩」，⁷⁶這與《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的宗旨是一致的。

另一位宗朱學者鍾芳（1476-1544）同樣反對王學士人的訓蒙理念。

73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48〈諸儒學案中二〉，頁 1154。

74 明·崔銑，《洵詞》（《明別集叢刊（第二輯）》第 5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卷 9，頁 160。

75 明·崔銑，《士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4 冊），卷 3，頁 508。

76 明·崔銑，《洵詞》，卷 7，頁 132-133。

鍾芳曾著《小學廣義》一卷，⁷⁷今或未存。根據該書一卷的篇幅可以推測，《小學廣義》未必是對《小學》全文的注釋本，可能是對「小學」的義理性發揮。鍾芳反對「致良知」之說，因為該說過分強調內心的自足而忽視外在「多聞多見」的學習。⁷⁸他在與羅欽順（1464-1547）的通信中就曾批評王陽明推崇「致良知」、因而導致忽視「小學」工夫的結果：

渠（按：王陽明）必欲與一貫之旨合而謂自吾之良知推致之，竊恐所見未的，不免任性作用以限於異端。（中略）古者小學習灑掃應對、事親敬長之節，未嘗不誦詩讀書、講禮肆樂以開發其聰明。《周禮》教民六德而先之以知，正謂小學收放心、養德性。既已啟其知矣，故入大學，又使之推廣其知以究事理之極而盡修己治人之道。朱子所謂「收小學之成功」者，是也。⁷⁹

鍾芳反對王陽明將「致良知」視為自得之學，他認為《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表明人「力學而可至」，並不是不用學而人人可以達到。鍾芳很強調為學的順序。他相信聖人為學不舍工夫次第，「自小學孝弟謹信，詩書六藝之教固已培養此誠，而以漸開發其聰明矣」，這為之後「大學」的修齊治平奠基；⁸⁰同時他指出聖人之教的特點在於「先後有序，固不顯而驟，亦不秘而藏」，而當今的學者「厭卑近而樂恬怡，惰形神而守空寂，未窺局闕輒效風沂」，追求「冥心默坐」，而「於下學次第置之度外」，這種做法是十分荒謬的。⁸¹就「小學」的具體內容而言，鍾芳認為應該教

77 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3〈小學類〉，頁105。

78 明·鍾芳，《筠溪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3冊），卷20〈讀書劄記〉，頁36。

79 同上註，卷12〈與整庵第二書〉，頁636。引文中朱熹的原話見《大學或問》：「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于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于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宋·朱熹，《大學或問（上）》（《朱子全書》第6冊），頁505。

80 明·鍾芳，《筠溪文集》，卷6〈困知記序〉，頁529。

81 同上註，卷10〈存養〉，頁584。

之「孝弟謹信，歌詩諷詠，書數禮讓升降進退之節，雖鳥獸草木亦所不遺」，⁸² 這與前引鄒守益批評後世「鑽研於書策」並「考索於鳥獸草木」⁸³ 的學術旨趣顯然有所區別。

曾問學於王雲鳳與鍾芳的胡纘宗（1480-1560）反對「陽明以小學大學不當分」的做法。他反問道：「然事雖若一，學不有先後乎？豈未朮之童即當盡心盡性，既冠之士猶當灑掃乎？」因此，就像登高必須從卑處起步，童蒙之教應「小學教之以事」，有此基礎，之後的「大學」才能「教之以理」。相比於王陽明將「學問之道」歸結為「求放心」，胡纘宗認為「學問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博約」，⁸⁴ 這與「道問學」的取向是一致的。

針對明中後期多元思想競起帶來的衝擊，正嘉以降的程朱學者也通過對《小學》文本的改動做出正面的回應。馮柯（1523-1601）的《小學補》便是典型。

馮柯有著鮮明的尊朱立場，後學評價其「蓋篤信考亭，闡發道突，辟致良知之說為非然者」。⁸⁵ 《小學補》是馮柯對朱熹《小學》的補充，篇幅很小，具體的篇章安排是：將《論語》中「弟子入則孝」一章視為「經」，然後分別為「孝」、「悌」、「謹」、「信」、「汎愛眾」、「親仁」和「餘力學文」作百餘字的「傳」加以解釋。⁸⁶ 例如，馮柯為「釋餘力學文」所作的傳為：

率知能達愛敬而滋成行義之美者，謂之文。文者，文此行也。（中略）人秀靈於百物而所以致隆於尊親者，不節不文，則嫌於禽獸矣。（中略）故詩禮者，聖人刑家之大訓也。學詩則惠順而鄙詐不萌，學禮則直方而邪僻不入。**是故其節著，其文理，其義行，其道美而小學成矣。**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⁸⁷

82 明·鍾芳，《筠溪文集》，卷 10〈臨川吳氏評通志〉，頁 596。

83 明·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17〈跋大學古本〉，頁 800。

84 明·胡纘宗，《願學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938 冊），卷上，頁 413、425。

85 明·黃鳳翔，〈貞白馮先生五書序〉，明·馮柯，《貞白五書》（《叢書集成續編》第 170 冊），頁 500-501。

86 明·馮柯，《貞白五書》，頁 542-544。

87 同上註，頁 544。

馮柯將「學文」詮釋為詩禮的具體實踐，認為兒童只有學習詩禮之後，才能具體落實愛親敬長的行為，這才是完整的「小學」工夫。

《小學補》與前述耿定向《小學新編》在體例上頗為相似，但二者的根本差異在於：《小學補》旨在「述朱」而非「變朱」。隆慶四年至五年（1570-1571）馮柯撰寫《求是編》專門護朱攻王。⁸⁸王陽明曾認為今本《大學》將「格物」置於「誠意」之前可能導致學者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朱熹需要補一個「敬」字才能勉強牽和。對此，馮柯批評王陽明的觀點，並順便道出了他著《小學補》的用意。馮柯認為古者教人之法就有「小學」與「大學」之分，「小學」的作用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從而為「大學」的格物窮理工夫奠基。朱熹以「敬」字補小學是因為有些年歲已長的人幼時沒有經歷過「小學」工夫，因此朱熹希望他們以主敬涵養的方式彌補欠缺的「小學」工夫。馮柯進一步指出，自己著《小學補》的用意在於，《論語》「弟子章」中的「學文」是「小學之終事」，「格物」是「大學之始事」，「格物」緊承「學文」，懂得「學文」是「窮理」的道理，也就自然懂得「格物」是「窮理」的道理。朱熹的《小學》雖摘錄了「弟子章」，但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沒體現「格物即承學文之意」，因此，馮柯特地模仿《大學》經傳的體例，將該章摘出加以表彰。馮柯希望《小學補》可以在讓孩童明白「小學」與「大學」次第的同時，也回擊對朱熹「格物」理解的諸多「異論」：

令初學小子無苦難厭煩之心，且一開卷即曉然知小學大學相承之次，而於格物之旨不講而明，諸儒之疑不辯而決。是因小學而兼明大學，未必無小補於聖門矣。⁸⁹

因此，馮柯並不僅僅是為了便於童蒙閱讀而著《小學補》，其深層用意在於針對陽明學對《大學》與「格物」的異端言論，明確「小學」與「大學」的次第關係，並彰顯程朱學對「格物」的正確詮釋。誠如後學評價馮柯「以《小學》『學文』與《大學》『格致』並舉互言之，而以謹信之義貫徹於其中，

88 有關《求是編》的思想史意義，可參林月惠，〈非《傳習錄》：馮柯《求是編》析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6(2000.3): 375-450。

89 明·馮柯，《貞白五書》，頁 636-637。

可謂親切有味，真足以羽翼考亭，上遡洙泗」。⁹⁰ 因此，《小學補》是典型明中後期思想競爭中的產物。

（三）《小學》的邊緣化和理學士人的因應

王學士人對「良知」的強調表明孩童天生就懂得愛親敬長的道理，不必通過後天嚴格的學習才能習得。這種訓蒙理念衝擊了程朱學者主張的「小學」工夫，也弱化了閱讀《小學》的必要性。正因為此，宗朱學者常常將《小學》在明中後期的邊緣化與陽明學聯繫在一起。除了前引唐龍和陸隴其的觀點，刁包（1603-1669）也認為王學著作的傳布衝擊著《小學》的閱讀：

自周海門（按：周汝登）《聖學宗傳》一書梓行於世，令末學晚進，謬謂吾心自有《六經》，不必更求諸《六經》也；吾心自有《四書》，不必更求諸《四書》也。《近思錄》《小學》窮狗而筌蹄矣。⁹¹

《小學》在嘉靖中葉之後閱讀世界中的邊緣化是不可否認的事實。⁹² 但是，陽明學思想的衝擊並不是造成《小學》邊緣化的唯一原因。《小學》的邊

90 明·黃鳳翔，〈貞白馮先生五書序〉，頁 500-501。

91 明·刁包，《用六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96 冊），卷 2〈答孫地平少宰書三〉，頁 247。

92 浙江黃岩人黃綰（1480-1554）回憶童年塾師教之以《小學》，而「近年以來」《小學》不講不讀，由此可推測在成化年間的浙江，童蒙尚且學習《小學》，而到了嘉靖中期則逐漸邊緣化。浙江桐鄉人李樂（隆慶二年〔1568〕進士）則回憶自己年少在鄉塾讀書時，「蒙師訓其弟子，往往多讀《小學》、《孝經》，而等到自己四十之後則「讀者鮮矣」；江蘇太倉人管志道（1536-1608）同樣回憶自己幼時鄉塾的塾師「令讀《孝經》、《小學》二編，以開其始」，而如今縉紳家則多將《小學》「束之高閣」。山東德平人葛昕（1542-1602）也有類似的回憶，並指出「今《小學》在里師處不多見，而《孝經》至市坊無售本」。這些論述反映出，至少在嘉靖中葉的江浙和山東鄉塾，《小學》在訓蒙實踐中仍被選為主要的讀物之一。以上引文分別見：明·黃綰著，劉厚祜、張豈之點校，《明道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頁 35-36；明·李樂，《見聞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8，頁 663；明·管志道，《從先維俗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88 冊），卷 2，頁 298；明·葛昕，《集玉山房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6 冊），卷 6〈刻孝經引〉，頁 459。

緣化現象，與其未被納入科舉系統、文本的晦澀以及其他相關蒙學讀物的興起均有關係。盧格（成化十七年〔1481〕進士）就曾指出《小學》在這方面的困境，並主張應對《小學》文本進行刪節：

其中（按：《小學》）條目詳盡，而初學反懼其繁，習舉子業者，或捨而不讀。以故《小學》教人之旨，未周於天下。今當擇其有關於童蒙者，編為《節要》，授其講習。若夫修齊治平之道，與夫《論》《孟》經史之言，俟其習《大學》而後教之，庶幾教者有序，讀者不繁，而此書盛行矣。⁹³

賀欽也曾作「紫陽《小學》人誰讀，祭酒居然教不行。念念只歸官祿上，謾言父母與神明」一詩感嘆舉子不讀《小學》的現象。⁹⁴ 萬曆時期的士人也觀察到「國朝以藝文錄士，非不首以六經四書」，《小學》不在其列，因此導致晚近以來的童蒙教育對《小學》「廢格而弗講」。⁹⁵ 嘉靖二十八年（1549）翁大立（1517-?）和萬曆十六年（1588）周明宇（生卒年不詳）在河南任督學時，在童試和提學院道之試中用《小學》考核童生與生員，要求「民生不熟《小學》者不收，庠士不精《小學》者降等」，當時學風為之一變。而當二人離職後，《小學》又淪落到「坊間無刻而崇尚無人」的境地。⁹⁶ 除此之外，士人常常因《小學》文本的晦澀而選擇其他替代物用以訓蒙。例如，王祖嫡（1531-1591）認為訓蒙讀物「貴實不貴文，貴近不貴遠」，而《小學》一書「尚藻績而忘悃愊，採異代而略目前，非所以訓子孫也」。因此，他親自編寫《童訓》和《家庭庸言》以代替《小學》來教育子孫。⁹⁷ 再如晚明《楊氏塾訓》收錄上至先秦典籍、下至薛瑄和王

93 明·盧格，《荷亭辯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01冊），卷8〈論小學〉，頁528。

94 明·賀欽，《醫閭先生集》，卷8〈俗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之〉，頁965。

95 明·彭端吾，〈刻小學圖序〉，明·不著撰者，《小學書圖隱括纂要》（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頁4上-4下。

96 明·呂坤，〈重刻小學序〉，明·不著撰者，《文公小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三十七年〔1609〕刻本），頁3上-4上。

97 明·王祖嫡，《師竹堂集》（《明別輯叢刊（第三輯）》第87冊），卷9〈家庭庸言序〉，頁117-118。

陽明的事例，王學士人曾同亨（1533-1607）評價此書「言簡約而醒，觀覽其旨，切實而便」。⁹⁸類似的蒙學讀物在明代還有很多。⁹⁹這些蒙學讀物的湧現，使得《小學》不再是明人訓蒙的首要或唯一的選擇。

《小學》邊緣化的現象也是王學士人面對的現實。雖然王學士人的訓蒙理念與程朱學者並不相同，但是，他們畢竟同屬理學傳統。為了改變《小學》邊緣化的現狀，一些立場相對溫和的王學士人也會倡導世人閱讀《小學》，不過他們往往從「良知」的角度闡明《小學》的訓蒙意義。例如，何廷仁（1486-1551）既相信孩童自然懂得愛親敬兄就是良知良能，也提倡教授童蒙《小學》，讓他們學習樂歌和禮節，從而「全其良知良能」。¹⁰⁰魏良弼在為松陽縣定的社學條規中一方面要求「教小學生專以《孝經》《小學》為主」，同時也鼓勵學生靜坐，認為靜坐能「隨分體認天理而良知自不昧矣」。¹⁰¹現存嘉靖三十三年（1554）刊刻的《小學句讀》，書前有王陽明弟子徐霈（1511-1600）所作的序。徐霈自述弱冠時追隨王陽明學習良知之教，並因此厭惡科舉，對朱熹的注釋持「怠觀」的態度，¹⁰²所謂「早歲得師承，良知有真訣」。¹⁰³因此，他在為陳選《小學句讀》作序時也很自然地從「良知良能者，天之性也」的角度詮釋閱讀《小學》的意義。¹⁰⁴鄒守益的三子鄒善（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同父親一樣主張學問

98 明·曾同亨，〈楊氏塾訓序〉，明·楊兆坊，《楊氏塾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52 冊），頁 82。

99 有關明代道德類訓蒙讀物的初步整理，可參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和書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頁 206-209。

100 明·何廷仁，《（萬曆）新會縣誌》（《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 49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卷 3〈社學訓規〉，頁 539-541。

101 明·魏良弼，《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85 冊），卷 3〈松陽縣社學條規〉，頁 56-57。

102 明·徐霈，〈邵養齋先生講意纂要序〉，《東溪先生文集》，卷 3，收入黃靈庚、諸葛慧豔主編，《衢州文獻集成》集部第 17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頁 416。

103 明·徐霈，《東溪先生文集》，卷 13〈講舍詠〉，頁 36。

104 明·徐霈，〈小學句讀序〉，明·陳選，《小學句讀》（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嘉靖三十三年〔1554〕刻本）。該序並未收入目前可見的《東溪先生文集》中。

之道在於「識其本心而事事操習」，而「本心」即是「不學不慮之良」。他強調「本心」在閱讀經籍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若本吾之真心以陳說經史，即此成說即行所明也，安可以為逐物？
本吾之真心以習禮講《小學》，即此講習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為末藝？¹⁰⁵

從鄒善的表述可以推斷，當時不乏將閱讀經史和《小學》貶斥為「逐物」和「末藝」的觀點，鄒善對此並不認同。但他反對輕視經史與《小學》的理由仍是強調主觀的「吾之真心」的優先性，這也體現王學士人與程朱學者對《小學》側重角度的差異。

程朱學者也需要通過對《小學》文本的改動來扭轉《小學》在中晚明邊緣化的情況。孫揚（1486-1546）所改編的《小學韻語》即是一例。

孫揚具有鮮明的尊朱立場。¹⁰⁶他曾前往浙江與王陽明討論學問，但終究不能贊同陽明學說。¹⁰⁷因此，他在嘉靖七年（1528）專門成書《質疑稿》，以程朱之學反駁《傳習錄》中的學說。孫揚在《質疑稿》中著重突顯程朱學「道問學」的一面，反對王陽明過於強調本心自足而忽視後天學習的做法。例如，孫揚強調事父事君的道理必須通過後天的「外面讀書學問工夫」才能懂得，而不能「只消在此心上用功」。¹⁰⁸同時，他認為「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具於載籍之中，故當博學于文，以窮天下事物之理」，不能夠「只是念念要存天理，而不務窮理實踐工夫」。¹⁰⁹

孫揚對朱熹《小學》一書的尊奉，與他對「格物致知」工夫的強調

105 明·鄒善，〈穎泉先生要語〉，鄒守益、鄒善、鄒德涵等，《鄒氏學脈》（《續修四庫全書》第938冊），卷2，頁499、502。

106 《金華理學粹編》將其歸為「朱子私淑門人」。清·戴殿江輯，《金華理學粹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12冊），卷9，頁187。

107 明·孫揚，《孫石台先生遺集》（《明別集叢刊（第二輯）》第59冊），卷1〈質疑稿序〉，頁307-308。

108 明·孫揚，《質疑稿》，卷1，收入黃靈庚、陶誠華主編，《重修金華叢書》第9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85。

109 同上註，卷1，頁91、卷2，頁98。

是一脈相承的。孫揚贊同童蒙學習必須遵循先「小學」而後「大學」的有序過程，並高度肯定朱熹編纂《小學》一書的功績。但是，孫揚同時指出，《小學》一書中包含過多的「古語」和「長辭」，不便閱讀，導致兒童更青睞於閱讀《蒙求》和《千字文》這樣包含對句俚語的蒙訓讀物。為了使《小學》一書獲得更大的讀者群，孫揚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將《小學》一書的前三卷用五言韻語改寫，編成《小學韻語》，以此增加《小學》的可讀性。¹¹⁰換言之，《小學韻語》的出現固然有強調朱熹「小學」之教以對抗陽明學的潛在意圖，但其更直接的目的可能仍在於扭轉《小學》邊緣化的現狀。

孫揚通過改編《小學》以期增加其可讀性的作法在其他士人身上也有體現。例如，黃佐（1490-1566）在正德六年（1511）便指出《小學》「書既浩繁，理涉宏奧」，擔心童蒙會不願意閱讀此書。因此，他保留《小學》「內篇」中切要的部分，並增添《禮記》等經典中的相關條目，編成《小學古訓》一卷。¹¹¹此書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仍被刊刻用於廣東的私塾。¹¹²晚明士人也將《小學》的簡編本用於地方教學。萬曆二十二年（1594）由浙江錢塘知縣與社學生共同參編《新刊社塾啟蒙禮教類吟》一書中就包含「小學吟」。編者指出《小學》「書雖存而知者鮮矣」，其原因在於《千家詩》流行，而《小學》有「辭曲」和「理隱而晦」的缺陷。因此編者順章摘句並刪繁就簡，最終「聯成五言《小學》」，方便童蒙吟誦。¹¹³

110 明·孫揚，《孫石台先生遺集》，卷 1〈小學韻語序〉，頁 306。《小學韻語》前三卷「立教」、「明倫」和「敬身」，由孫揚根據《小學》原文用五言韻文改編鋪陳，第五和六卷則是朱熹《小學》「嘉言」和「善行」的原文，見氏著，《小學韻語》（《重修金華叢書》第 100 冊）。

111 明·黃佐，〈小學古訓序〉，《小學古訓》，收入陳建華等主編，《廣州大典（第四輯）》第 3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頁 95。

112 明·程昌，〈刻小學古訓序〉，明·黃佐，《小學古訓》，頁 96。《小學古訓》的具體內容為「威儀」、「動作」、「居處」、「執事」、「飲食」、「衣服」、「灑掃」、「應對」、「進退」、「明倫」、「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學文」、「禮樂」、「射御」和「書數」。

113 明·柳應龍，《新刊社塾啟蒙禮教類吟》（《故宮珍本叢刊》第 476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 3〈小學總意〉，頁 368-369。

上述編者對《小學》文本內容或篇幅的改動，其背後未必有直接對抗王學思潮的動機，而更多考慮的是如何通過增加《小學》的可讀性使其被更多學子閱讀。筆者雖然在本節論述了王學士人與程朱學士人訓蒙理念的差異，但筆者並不認為中晚明《小學》邊緣化的現象以及文本改動情況全部要歸因於「程朱學 vs. 陽明學」的解釋框架中。¹¹⁴ 王學思潮的衝擊固然是《小學》邊緣化諸多「因」中的一個，但同時王學士人和程朱學者一樣也面對著《小學》邊緣化的「果」。對於同屬理學傳統的兩派學者而言，他們會從各自的學術立場闡明《小學》的意義。在考察二者差異性（程朱學者很容易刻意放大這種差異性）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他們的相似之處。

四、複調：湛若水與《古文小學》

湛若水《古文小學》是明代思想競爭中極富編纂者思想特色的作品。該書對當時思想界主流的程朱學與陽明心學的訓蒙理念均有回應，充分折射出《小學》改本在思想競爭中的「複調」色彩。

湛若水尤其喜歡對既有的經典進行文本改動或再編輯。除了《古文小學》之外，他還編撰有《古樂經傳》、《補樂經》、《修復古易經傳訓測》、《修復四書古本測》（包括《古大學測》和《中庸測》）、《厘正詩經誦》和《二禮經傳測》等著作。¹¹⁵ 這些著作中如《修復四書古本測》，專門是針對作為科舉定本的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而作。湛若水特別強調其著述之「古」，反映了明中期部分士人試圖擺脫宋儒注解，直接回向先秦原典的心理。

114 此點承蒙匿名審稿人批評提醒，在此特別致謝。

115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泉翁大全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卷 18〈二禮經傳測序〉，頁 539-540、卷 23〈修復古易經傳訓測序〉，頁 655-657、卷 24〈修復四書古本測序〉，頁 666-667；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卷 2〈釐正詩經誦序〉，頁 37-40；游騰達、王文娟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8）“詩文彙編”部分〈補樂經序〉、〈古樂經傳或問〉，頁 132-133，153-167。

湛若水對朱熹《小學》頗有不滿。首先，湛若水指出《小學》「立教」、「明倫」、「敬身」三篇的立意與「小學原序」不一致，因為朱熹在序中只提及「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親師友之道，皆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並無「立教」等論述；其次，《小學》選取了許多漢朝以後的事例和宋儒的言論，湛若水認為其內容不合古義；第三，湛若水批評《小學》中的「君臣」和「夫婦」等篇涉及大人之事，並不是童子該學的內容。¹¹⁶ 湛若水在與弟子的對話中也時常透露出他對《小學》的微詞。例如湛若水與弟子講學時批評《小學》「既非古書之舊」，而且其中所收鄧攸諸人「過中之行」的例子，十分不當。¹¹⁷

湛若水認為三代以來「王者之風熄而教弛」，導致後人誤以為有關童子之事的「小學」與關於大人之事的「大學」工夫不傳。他指出「小學」與「大學」工夫其實並未亡佚，先賢有關「大學」工夫的論述被收入《禮記》一書，之後二程將其從《小戴禮記》中單獨抽出加以表彰；而先賢有關「小學」工夫的論述則散見於《禮記》諸篇中，只是並不像「大學」文字那樣集中而已。¹¹⁸ 因此，湛若水「采其散見於《禮記》者，輯為《古小學》一書」，其具體內容則遵循前引朱熹「小學原序」的本旨，「首之以蒙養，次而灑掃、而應對、而進退、而事親敬長、而隆師親友、而禮樂射禦書數，凡七篇，皆古文也」。¹¹⁹ 湛若水特別表示《古文小學》不同於朱著《小學》之處在於「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躐也」，同時不選錄任何秦漢以後的事例或言論，「恐其混古鼎彝也」。¹²⁰

《古文小學》雖初成於正德年間，¹²¹ 但現存的嘉靖本是湛若水在聽聞

116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泉翁大全集》，卷 37〈進古小學疏〉，頁 965-966。

117 同上註，卷 3〈知新後語〉，頁 54。

118 同上註，卷 16〈古小學序〉，頁 493-494。

119 同上註，卷 37〈進古小學疏〉，頁 965-966。

120 同上註，卷 16〈古小學序〉，頁 493-494。

121 湛若水在〈進古文小學疏〉中寫道：「臣不自揣，于居山時，常依朱子序文本意，采其散見於《禮記》者，輯為古小學一書」；而湛若水也曾將閱讀《古文小學》的要求納入其〈大科書堂訓〉，而「大科」即指西樵大科峰，湛若水在此建立書院講學。

嘉靖帝皇子朱載堦出生後，在原有文本的基礎上進行有針對性的增補後進獻給嘉靖帝的。其中最明顯的特點便是書中對「世子」教育內容的強調。例如《古文小學》中引用《禮記》〈文王世子〉中的諸多內容、將「事親敬長上」的主要內容概述為「太子、世子事親敬長凡六章」、討論「六藝」中的「射」和「御」部分時也有天子以射術取士以及「君御車之禮」等內容。¹²²

湛若水這一類似政治投機的行為與他當時的政治際遇不無關係。湛若水在「大禮議」中支持楊廷和（1459-1529），被降為南京國子祭酒，後又改為南京禮部左侍郎。他很有可能希望借助此次獻書重新獲得皇帝的信任。嘉靖本《古文小學》背後的政治用意，使得其內容與湛若水反對朱熹《小學》參雜「大人之事」的批判之間出現了自我矛盾的情形。湛若水常常將侍奉父母之事與侍奉君主聯繫在一起，而他反對朱熹《小學》的理由之一恰恰是其中夾雜著「君臣」等大人之事。例如他在《古文小學》的相關注解中指出：

吾於是見天理之流行矣！夫理一也。在父為慈，在子為孝，在君為仁，在君為仁，在臣為敬，故君臣易道則亂，父子易道則悖，悖亂之道興而家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各得其道而天下治矣。（中略）可見天理流動而不居矣。¹²³

拋開湛若水的政治用意暫且不論，湛若水也借助《古文小學》表達自己的理學主張。他在每一條選自《禮記》的條目後均會附有自己的解讀，而其中往往融入他對「天理」的理解。例如他在談及飲食便指出「飲食，人之大欲也，故先王有禮以制心。情勝則流而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而在注解《禮記》關於交友的條目時則說：「此朋儕交際之禮也。（中略）一往一

參見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泉翁大全集》，卷 5〈大科訓規〉，頁 100、卷 37〈進古小學疏〉，頁 965-966。

122 明·湛若水著，《古文小學》，游騰達、王文娟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卷 1〈蒙養第一〉，頁 269、271、卷 3〈事親敬長上〉，頁 289、卷 6〈隆親師友第六〉，頁 311、卷 9〈六藝下〉，頁 341、344。

123 明·湛若水，《古文小學》，卷 4〈事親敬長中〉，頁 293。

來，天之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故禮也者，義而已矣。義也者，稱而已矣。往來酬酢之間，無一而非天理也」；談到禮樂時則強調其內涵在於「去欲以存理者也」。同時，《古文小學》中關於侍奉父母之事，湛若水也常常將其與「天理」聯繫在一起，例如他強調「天理流行於事父母之時矣，嚴威儼恪非事親也，非天理也」。¹²⁴

雖然湛若水與明初「非朱氏之言不遵」的士人不同，他幾乎修改了朱熹《小學》的全貌，剔除了所有宋儒的言論，並在其中加入了自己「體認天理」的主張，但是，湛若水對「小學」之教的理解與重視，以及他對同時期王陽明「致良知」的批評，這些思想特徵反而更接近於程朱學。換言之，湛若水對「小學」的理解仍在「述朱」的延長線上，其《古文小學》較之吳訥等學者的增注本當然算是一種「變調」，但這一「變調」更像是舊曲新編而非重譜新曲。

湛若水有關「小學」觀點的複雜性在於：一方面，湛若水批評朱熹「分人事天理為兩段」的做法過於支離。他認為「人事即有天理」，所謂的「下學」，便是學習「天理」，不必如朱熹主張的先學基礎的人事，再學高深的天理。¹²⁵但另一方面，湛若水又十分認可朱熹「小學」所提倡的「敬」字。湛若水曾感歎三代之道不明的原因便是後人忽略了「小學」功夫，而解決方法便是如孔子所言對人事保有「執事敬」的態度。¹²⁶湛若水認為唯有「敬」才能使「小學」功夫復興，這與朱熹以「敬」補「小學」功夫的觀點是一致的。他主張「『敬』字宋儒之論詳矣」，而針對有人認為「『敬』字不免重贅」的觀點，湛若水並不贊同。¹²⁷對「敬」持批評態度的士人具體即指王陽明。湛氏弟子郭應奎（生卒年不詳）曾認為朱熹強調「小學」與「大學」功夫全歸於「敬」字，而王陽明作於正德十三年（1518）的〈大

124 明·湛若水，《古文小學》，卷 4〈事親敬長中〉，頁 291、卷 5〈事親敬長下〉，頁 307、卷 6〈隆親師友第六〉，頁 318、卷 7〈六藝第七上〉，頁 324。

125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泉翁大全集》，卷 70〈新泉問辯錄〉，頁 1720。

126 同上註，卷 1〈樵語〉，頁 8。「執事敬」出自《論語》〈子路〉：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127 同上註，卷 9〈答黃孟善〉，頁 282-283。

學古本序〉「合之以『敬』而益離」，¹²⁸ 郭應奎因此詢問湛若水王陽明「病朱子」的這種做法是否過分，湛若水回答道：

朱文公《或問》前序小學大學之事，內中已裝一「敬」字了，後面總提這「敬」字來說，使人知用功之本只得如此說，非添上敬字，何得為贅？文公見之必不服。¹²⁹

湛若水與王陽明更大的分歧在於對「良知」的批評，而這一批評恰恰有助於我們理解湛若水作《古文小學》的動機之一，並證明湛若水對「小學」工夫的重視是長期一以貫之的。

嘉靖十九年（1540），湛若水致仕還鄉，九月到達韶州精舍，在明經館講學。在講到《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一語時，湛若水指出王陽明論學提倡「不待學與慮，不消得讀書學問，路上三尺童子皆能之」的良知，這是對《孟子》觀點的誤讀。湛若水認為天下事皆依靠學與慮才能行能知，即使對心存敬愛之念的兒童亦須教其學才能成才。他指出童子亦有時打罵自己父母，甚至可能有敬愛自己的父母兄弟而殺害他人父母兄弟的情況，因此「必學問思辨以開其知，篤行以固其知，知行並進，涵養以擴充之，尤一念良知良能之愛敬以達於無所不愛其親」。¹³⁰ 這一理解與朱熹對此章不強調「不學不慮」，而強調由個人的愛親敬長而擴充到他人的詮釋是一致的。¹³¹ 湛若水多次強調內心的「敬」與後天的「教」在童蒙教育中的關鍵作用。湛若水認為「敬」而非「良知」才是「學問規矩」，

128 這句話在〈大學古本序〉中是王陽明批評朱熹的《大學》改本「合之經而益綴，補之傳而益離」，謝廷傑所編《王文成公全書》「經」字作「敬」字，參明·王陽明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第1冊，頁294。

129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28〈問疑續錄〉，頁635。湛若水對王陽明對《古本大學》本就有不滿之處，參劉勇，〈王陽明《大學古本》的當代競爭者：湛若水與方獻夫之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0(2015.1): 159-181。

130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泉翁大全集》，卷12〈韶州明經館講章〉，頁361-363。

13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353。

因為「敬立而良知在矣」。¹³² 另外，兒童成長過程中如果沒有師友的幫助則會變得愚昧，因此「須多聞多見以開發吾之天聰明」。湛若水相信「古人在胎中始生，至孩提以往皆有教有學以擴充之」，這其中的「教」便包括《古文小學》中所蘊含的蒙養工夫。

針對當時盛行的「良知說」與「教」的關係，湛若水總結道：

今說致良知，以為「是是非非，人人皆有，知其是則極力行之，知其非則極力去之，而途中童子皆能」，豈不害道。子等慎之！若云致良知，亦用**學問思辨篤行之**，則吾敢不服？¹³³

雖然湛若水批評朱熹《小學》並在《古文小學》中幾乎改變了《小學》的全貌，但綜合從其思想表述可知，湛若水的《古文小學》雖在形式上「變朱」，但其側重「道問學」的思想內核仍是「述朱」的。時人對《古文小學》也多有肯定。湛若水的弟子崔涯（嘉靖八年〔1529〕進士）便稱讚其師以朱熹「小學原序」的標準而編撰《古文小學》的行為，並指出雖然朱著《小學》與《古文小學》的文本內容存在差異，但二者「救世立教之心」是一致的。¹³⁴ 胡纘宗也讚賞該書「得古小學教人之實要，要亦本朱子《小學》」，並認為其「深得晦翁本旨，當與朱子《小學》並行」。他同時相信如果《古文小學》能夠在地方學校頒行，讓初學的童蒙身體力行，那麼「小學根本既立，及入大學便能尋向上達，可為聖賢矣」。¹³⁵

湛若水與其《古文小學》在形式與內容方面與朱著《小學》相比均有不同之處，這可以說是一種「變調」。但正如湛若水所言，《古文小學》終究是依朱熹「小學原序」的宗旨而編，因此《古文小學》對《小學》的改編仍是在「述朱」的傳統內「變」。這種新中有舊，舊中有新的文本呈現，展現了明代中後期思想競爭中多元觀點的交錯。

132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7 冊），卷 23〈語錄〉，頁 120。

133 同上註，頁 124。

134 明·崔涯，《筆山崔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94 冊），卷 7〈古文小學後說〉，頁 95。

135 明·胡纘宗，《願學編》，卷下，頁 444、452。

五、結 論

明中後期新興學術思潮的盛行，使得許多士人對朱熹《小學》與「小學」之教的態度較之前代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明中後期的程朱學者在強調「小學」之教以應對多元思想衝擊的同時，也通過對《小學》文本的改編從而使《小學》的宗旨更加明白，文本更易於閱讀。在明中後期「變朱」的思潮下，無論是程朱學者還是非程朱學者，他們都參與到對朱熹所編《小學》這一經典理學讀物「變」的過程中，其各自的目的也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

與明前中期多數士人謹守程朱學矩矱不同，明中後期的王學或湛學士人開始對《小學》表達自己的異見。在思想言說層面，多數王學士人傾向於強調童蒙與生俱來的「良知」，因而輕視後天繁瑣的「灑掃應對」等學習內容；而在具體的訓蒙實踐層面，王學士人對《小學》文本進行刪節，或者推翻朱熹的《小學》原文，重新編輯相關的訓蒙讀物。值得注意的是，王學士人本身是複數的群體，並非所有王學士人均反對閱讀《小學》，面對明中後期《小學》邊緣化的現實，他們也試圖從「良知」的角度對《小學》進行詮釋，並呼籲世人閱讀《小學》。而此時具有激烈反對陽明學色彩的程朱學士人群體，則反復強調朱熹「小學」之教對於個人教育修身的重要性。他們致力於推廣《小學》，只是他們推行的《小學》並非如明前期的同道那樣具有層層疊加的注釋，而是經過他們改編後的文本。程朱學者內部以「變」的態度捍衛理學經典的方式，提示著明中後期思想世界的宗朱學者對程朱學的反省與調整。《古文小學》因為湛若水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體現出主旨與內容自相矛盾的特點。但就思想史意義而言，《古文小學》既是對朱熹《小學》的挑戰，也是對陽明學所信奉「良知」學的反駁。

如果說宋元至明前期主導理學士人訓蒙理念的朱熹「小學」之教仿佛一個單色的光點，那麼在多元思想競起的背景下，明中後期思想世界中的訓蒙理念則像是一道由濃逐漸變暗的光譜，光譜的一端是對朱熹「小學」之教的完全尊奉，另一端則是對其的反對，不同學術立場的士人則分布於兩端之間，呈現出傾向相近卻又不完全相同的特徵。

經典的變動不居始終伴隨著社會與思想學術的變遷。面對晚明王學末流空疏狂放的風氣對社會秩序的衝擊，晚明的思想界逐漸形成了「由王返朱」的思潮趨勢。在士人的思想言說和實踐層面，高攀龍（1562-1626）和馮從吾（1557-1627）¹³⁶等學者再次強調閱讀《小學》的重要性；即使是宗王學的劉宗周（1578-1645）也在家庭和地方教育中積極倡導《小學》，復興地方社學，並編輯《古小學集記》這樣的訓蒙讀物，希望童蒙能夠接受循序漸進的蒙養教育。¹³⁷在官方層面，崇禎朝頒布了以陳選注本為底本的禦制《小學》，¹³⁸並將其與《孝經》¹³⁹一起納入童生考試之中，其目的在於改變士人耽於科考而不顧道德修身的局面。明末出現了大量由士子或地方長官主持刊刻的《小學》讀本。這些讀本常常與《孝經》或《忠經》合刊，其中注釋的內容並無新意，但包含了許多應試的題目以及基本的答題思路，¹⁴⁰可見時人在科舉壓力下對《小學》態度的轉變。而這些轉

136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明別集叢刊（第四輯）》第 71 冊），卷 3〈困學記〉，頁 346、卷 10〈家訓〉，頁 628。明·馮從吾，《馮少墟集》（《明別集叢刊（第四輯）》第 49 冊），卷 6〈學會約〉，頁 152。

137 明·劉宗周，〈讀書說（示兒）〉，見劉宗周著、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 2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頁 297-298；〈古學記序〉、〈古小學通記序〉、〈重修古小學記〉，《劉宗周全集》第 4 冊，頁 35-37、頁 46，頁 150-151。高攀龍、馮從吾和劉宗周有關「小學」的論述也曾被後世的《小學》文本所收錄。例如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彭定求的《小學纂注》（兩卷，兩冊，道光元年〔1821〕刻本）前有「朱子《小學》序說」，其中便摘錄有許衡、薛瑄、胡居仁、蔡清、章懋、顧憲成、高攀龍、馮從吾和劉宗周關於「小學」的觀點。

138 明·陳選，《小學集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八年〔1635〕內府刻本）。

139 關於明末士人提倡《孝經》的概況，可參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207-213。

140 筆者所見這類《小學》注本包括：明·張溥，《張天如先生校正文公小學音注句解》（劍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宏明刻本）、明·陳仁錫，《小學絲綸》（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明·李春培，《小學主意衷旨》（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不知撰著者，《孝經忠經等書合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晚明雨花齋刻本）、明·姚張斌，《小學大全》（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和明·周文德，《小學旨意存是》（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弘化三年〔1846〕刻本）等等。這些《小學》注本開篇一般收有崇禎六年有關推行《小學》的聖諭。其內容除了《小學》文本的

謝曉東／明中晚期士人的訓蒙理念、實踐與多元思想競逐——以《小學》的改本與注本 121 為中心

變與明末至清初重視經典的風氣又有怎樣的因果聯繫，則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¹⁴¹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朱熹，《大學或問》，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宋·朱熹，《小學》，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1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元·何士信，《小學集成》，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元刊本。
- 元·吳澄，《吳文正公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明成化二十年刊本影印。
- 元·許衡著，許紅霞點校，《許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9。

注解外，還有許多針對《小學》文本的類比試題和解答思路。例如：《孝經忠經等書合刊》該書包括四種五冊，有《孝經集注指南大全》、《忠經集注指南大全》（以上為第一冊）、宋·朱熹著，陳選集註，周汝濤補注，《小學集注指南大全》（第二、三、四冊）和《太祖聖諭演訓》（第五冊）。編者在針對《小學》「小學原序」中「化與心成」和「小學題辭」中「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和的論題時分別指出：「此題見教弟子以《小學》，無非收其放心。及此心含養得純粹，自然消融其渣滓而有所感於德也」；「此題見天賦人以性，即全具仁義禮智四德以為百行之綱，維欲人從其大處，加保合之功也」，〈〈序〉〉，《小學集注指南大全》，頁 1 下、〈題辭〉，頁 3 上）

- 141 王汎森，〈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清初的講經會〉，均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 1-204；〈心即理說的動搖與明末清初學風之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1994.6): 333-372。

- 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叢書集成新編》第 6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幾輔叢書本。
- 元·蘇天爵著，陳高華、王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刁包，《用六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9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年熊仲龍刻本影印。
- 明·不著撰者，《小學書圖隱括纂要》，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 明·不著撰者，《文公先生小學集注大成》，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宣德九年（1434）刻本。
- 明·不著撰者，《文公小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三十七年（1609）刻本。
- 明·不著撰者，《孝經忠經等書合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晚明雨花齋刻本。
- 明·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9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刻本影印。
- 明·王祖嫡，《師竹堂集》，《明別輯叢刊（第三輯）》第 87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明天啟刻本影印。
- 明·王陽明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北京：中華書局，2017。
- 明·王雲鳳，《小學章句》，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寬文七年（1667）刻本。
- 明·王雲鳳，《虎穀集》，《明別集叢刊（第一輯）》第 81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據清光緒十八年刻本影印。
- 明·王畿著，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明·何廷仁，《（萬曆）新會縣誌》，《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 49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 明·吳訥，《性理群書補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宣德九年（1434）刻本。
- 明·吳與弼，《康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李春培，《小學主意衷旨》，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 明·李樂，《見聞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明·來時熙，《弘道書院志》，收入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 6 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 明·周文德，《小學旨意存是》，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弘化三年（1846）刻本。

謝曉東／明中晚期士人的訓蒙理念、實踐與多元思想競逐——以《小學》的改本與注本 123 為中心

- 明·周琦，《東溪日談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姚張斌，《小學大全》，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 明·柳應龍，《新刊社塾啟蒙禮教類吟》，《故宮珍本叢刊》第 476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明·胡居仁，《居業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胡松，《胡莊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91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胡梈刻本影印。
- 明·胡直著，張昭煒編校，《胡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明·胡纘宗，《願學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9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北京國家圖書館分館藏明嘉靖烏鼠山房刻清修本影印。
- 明·唐龍，《漁石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孫揚，《小學韻語》，《重修金華叢書》第 10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3，據清刻本影印。
- 明·孫揚，《質疑稿》，收入黃靈庚、陶誠華主編，《重修金華叢書》第 9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3，據清刻本影印。
- 明·孫揚，《孫石台先生遺集》，《明別輯叢刊（第二輯）》第 59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清乾隆四十四年盧衍仁等刻本影印。
- 明·徐需，《東溪先生文集》，收入黃靈庚、諸葛慧豔主編，《衢州文獻集成》集部第 17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據民國十五年刻本影印。
- 明·耿定向著，傅秋濤點校，《耿定向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明別集叢刊（第四輯）》第 71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明末刻本影印。
- 明·崔涯，《筆山崔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9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山西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崔廷健刻本影印。
- 明·崔銑，《洹詞》，《明別集叢刊（第二輯）》第 5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明嘉靖趙府味經堂刻本影印。

- 明·崔銑，《士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張溥，《張天如先生校正文公小學音注句解》，劍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明·陳仁錫，《小學絲綸》，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 明·陳選，《小學句讀》，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嘉靖三十三年（1554）刻本。
- 明·陳選，《小學集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八年（1635）刻本。
- 明·陳選，《恭愍公遺稿不分卷》，收入徐曉軍、李聖華主編，《浙學未刊稿叢編（第一輯）》第 1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
-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6、57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楷刻本影印。
-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泉翁大全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
-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
- 明·湛若水著，游騰達、王文娟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8。
- 明·賀欽，《醫閭先生集》，《叢書集成續編》第 112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據民國二十九年四明張氏約園刊本影印。
- 明·馮柯，《貞白五書》，《叢書集成續編》第 170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據民國二十九年四明張氏約園刊本影印。
- 明·馮從吾，《馮少墟集》，《明別集叢刊（第四輯）》第 49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明末刻本影印。
- 明·黃綰著，劉厚祜、張豈之點校，《明道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黃佐，《小學古訓》，收入陳建華等主編，《廣州大典（第四輯）》第 3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據嶺南遺書本影印。
- 明·楊兆坊，《楊氏塾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52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饒景暉刻本影印。
- 明·葛昕，《集玉山房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鄒守益、鄒善、鄒德涵等，《鄒氏學脈》，《續修四庫全書》第 9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
- 明·鄒守益著，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明·管志道，《從先維俗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8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徐文學刻本影印。
- 明·劉宗周著，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 明·劉元卿著，彭樹欣編校，《劉元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明·盧格，《荷亭辯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01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六年刻本影印。
- 明·薛瑄著，孫玄常等點校，《薛瑄全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
- 明·鍾芳，《筠溪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鍾允謙刻本影印。
- 明·魏良弼，《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8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熊劍化徐良彥刻本影印。
- 明·羅汝芳著，方祖猷、梁一群、李慶龍等編校整理，《羅汝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8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清·王朝璩輯，《饒雙峰講義》，《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二輯）》第 1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乾隆五十六年石洞書院刻本影印。
- 清·李元度，《小學弦歌》，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1882）刻本。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清·陸隴其著，王培友點校，《三魚堂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
-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清·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8。
- 清·錢大昕，《元史藝文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潛研堂全書本影印。
- 清·戴殿江輯，《金華理學粹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六輯）》第 1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乾隆五十六年石洞書院刻本影印。

清·魏瀛、魯琪光、鐘音鴻纂修，《（同治）贛州府志》，《中國地方誌集成·江西府縣誌輯》第 73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3。

二、近人論著

- 王蘭蔭 1935 〈明代之社學〉，《師大月刊》25(1936.2): 63-129。
- 王汎森 1994 〈心即理說的動搖與明末清初學風之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1994.6): 333-372。
- 王汎森 2013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池小芳 1998 《中國古代小學教育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朱鴻林 2005 〈明太祖的經史講論情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5(2005.1): 141-172。
- 吳 震 2011 〈略論朱熹「敬論」〉，《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1(2011.1): 11-17。
- 呂妙芬 2011 《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李仁淵 2021 〈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2021.9): 509-560。
- 束景南 2014 《朱熹年譜長編》（增訂版）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束景南 2015 《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增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束景南 2019 《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沈俊平 2009 《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周啟榮 1998 〈坊刻《四書》講章論明末考證學〉，收入郝延平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54-68。
- 林月惠 2000 〈非《傳習錄》：馮柯《求是編》析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6(2000.3): 375-450。
- 林桂如 2017 〈《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在日本之傳播〉，《東吳中文學報》34(2017.11): 91-118。
- （日）岡田武彥著，吳光等譯 2017 《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重慶：重慶出版社。

謝曉東 / 明中晚期士人的訓蒙理念、實踐與多元思想競逐——以《小學》的改本與注本 127 為中心

(日) 牧野修二 1979 〈元代の儒學教育：教育課程を中心にして〉，《東洋史研究》37.4(1979.3): 536-558。

(日) 松野敏之 2004 〈朱熹『小学』編纂考——劉清之小学書からの改修に関して——〉，《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13(2004.12): 1-26。

(日) 松野敏之 2016 〈宋代訓蒙書と朱熹『小学』〉，《國學院雜誌》117.11 (2016.11): 190-206。

(日) 松野敏之 2018 〈朱熹『小学』と朱寿昌譚〉，《国士館人文学》50(2018.3): 77-91。

金定炫 2011 「《小學集成》元刻本及朝鮮翻元本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

姚大力 2011 《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許齊雄 2009 〈國家政治目的和理學家教育理想在官學和科舉的結合〉，《漢學研究》27.1(2009.3): 87-112

陳榮捷 2009 《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志公 1992 《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和書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張舜徽 2002 《四庫提要序講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張衛紅 2013 《鄒東廓年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藝曦 2013 《陽明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郭曉東 2019 〈因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淺談朱子之「小學」對於理解其大學工夫的意義〉，《中國哲學史》2019.4(2019.8): 44-49。

熊秉真 2008 《童年憶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趙克生 2016 〈童蒙教育與朱子學的下移——明清時期兒童的《小學》閱讀〉，《社會科學輯刊》2016.1(2016.2): 132-142。

劉 勇 2015 〈王陽明《大學古本》的當代競爭者：湛若水與方獻夫之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0(2015.1): 159-181。

劉 勇 2016 《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三聯書店。

蔡春娟 2019 〈元代《孝經》與《小學》的地位及受學狀況〉，《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2019.12): 22-30。

Kelleher, M. Theresa. "Back to Basics: Chu Hsi's *Elementary Learning* (*Hsiao-hsüeh*).” 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edited by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2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Contestations on the Con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Teaching Children in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Adaptations of and Commentaries on *Elementary Learning*

Xie Xiaodong*

Abstract

From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o the early Ming, the con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scholars concerning the teaching of children predominantly followed the “elementary learning” 小學 advocated by Zhu Xi 朱熹 (1130-1200). However, with the formation of divisions in the intellectual world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emergent Yangmingism and thought of Zhan Ruoshui 湛若水 (1466-1560), or “Zhan studies” 湛學, both presente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raining children divergent from former practices. Scholars of Yangmingism were proponents of “liangzhi” 良知 (innate knowledge) and believed in the inborn filial piety of children. Some even thought that it was unnecessary to read the work *Elementary Learning*, which was one of several reasons for its marginalization in the mid-Ming. Other relatively moderate Yangming scholars who belonged to the tradi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stead attempted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the text’s peripheral stat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angzhi.” Facing the impact of Yangmingism and marginalization of *Elementary Learning* during this period, scholars of Cheng-Zhu 程朱 neo-Confucianism actively defended the legitimacy of Zhu Xi’s “elementary learning” and engaged in authoring new commentaries on the work that differed from those of their earlier counterparts. Regarding Zhan studies, a number of contradictions admittedly exist in *Guwen xiao xue* 古文小學 (*Classical Elementary Learning*) compiled by Zhan Ruoshui owing to specific political motivation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Zhan not only removed many Song Confucian discourses from *Elementary Learning* so

* Xie Xiaodo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s to illustrate his own view of “recognizing the principles of heaven everywhere” 隨處體認天理, but also used his book to express criticisms of the “liangzhi” advocated by the Yangming school. The influence of this ideological contestation on society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was far-reaching, affecting classics such as the *Great Learning* 大學—which were mainly for elites—as well as penetrating into *Elementary Learning* and other works for the teaching of children. These discussions on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of “elementary learning,” both the conception and the work, ultimately enriched the apprehending of the diverse and complex world of thought at the time.

Keywords: pedagogy, *Xiaoxue* 小學, *Elementary Learning*,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Yangmingism, Zhan Ruoshui